

微博不接受举报”为何叫人失望

唐伟

9月20日,广州市纪委官方微博正式上线。但运行1个月以来,有网友对微博不接受举报和投诉表示失望和质疑。对此,纪委常委梅河清表示,举报信息内容具有一定的保密性,为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及信息不被泄露,不宜过于公开,以免不利于案情的调查。

(据 新快报)

近来,无论是陕西省安监局原局长“表哥”杨达才的落马,还是拥有21套房产的番禺区城管局政委“房叔”蔡彬的被查,都源于微博在其间的持续发力形成的围观效应,并因此上升为公共事件而获得相关部门介入调查。在众多的反腐

案件中,均可以看到微博的身影。微博反腐,俨然已经成为一种最新的反腐方式。

不过,作为一种开放式的信息平台,微博举报和投诉确实存在着不可预料的风险。正如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林喆坦言,群众通过个人微博举报贪官,一方面容易“打草惊蛇”,另一方面也给自己人身安全带来了一些问题。正是出于对此的担忧,才使纪检等相关机构不接受举报和投诉,以此将风险控制最低程度,无论从技术层上,还是人性层面,这种规制都符合逻辑要求。

既然如此,为什么网友对微博不接受举报与投诉表示失望呢?这恐怕要从现实层面来剖析。应当说,

由于网民在看到了微博反腐的巨大能量,从而对其寄予了过多的期望。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恐怕还在于其他投诉举报渠道的不通畅,才能微博的作用更加凸现。具体到举报和投诉方式上,电话、官网网络举报平台、投送举报信、本人上访、手机短信等方式若能畅通,并能发挥作用的话,那么无论是“表哥”还是“房叔”就不会给微博揭发的机会。

微博是把双刃剑,关于微博举报与投诉命题的破立之争,其实也是诉求与行为反差所致。在公众看来,微博掀起的巨大反腐浪潮,确实让人有了参与监督的机会,以及让自身权利得到实现的快意,因而需要获得认可与正名;而对于公权部

门来说,微博的开放性,以及其不确定性,都不是最妥当的方法,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应当保持必要的严谨性,才能让风险在可控状态,问题在于,如何做好其他途径,让这种民意承载与功能寄望得到疏解?

从小偷反腐、情人反腐到内部反腐,各种另类化和偶然化手段的方兴未艾,其实更是对公职人员日常监管的讽刺,说明了日常监管呈现摆设化。对于有关部门来说,要让“微博不受举”的逻辑之证得到公众的理解,就必须解决反腐工作的现实之惑,从制度入手,从源头抓起,让其他举报和投诉渠道保持畅通和高效,实现反腐从形式之争向实质之变的递进。

《短评快》

“被慰问”该讨说法

金海燕

家住广州海珠区的严老太偶然间发现海珠信息网上有两则2011年的信息报道,该信息分别提到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借节日上门探望低保户、困难户,并送去了慰问品,她的名字在列,而她并没有受到过类似慰问。严老太认为名誉权受损,将街道办告上法庭。

(据 新快报)

因为在报道这场虚假慰问的新闻中,没有对严老太有过诽谤或贬低名誉的字句,法院驳回了严老太要求街道办赔偿名誉损失和精神损失的诉求。但从严老太的状况告诉我们,如今公民对于自己的名誉是越来越重视了,因为成了一次被虚假慰问的人员而成为街道办宣扬政绩的道具,公民也会为维护自己的名誉权而运用起法律武器,应当说,这是社会的进步。

严老太的状况在告诫我们的政府工作人员:面对群众,我们的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所谓慰问,体现的是一种关怀,一种亲切,不是通知被慰问者来领一盒月饼就能充数的,更不能把过去拍摄的照片,充当此次“慰问”的现场。诸如此类的弄虚作假,在过去常常被某些人视为“正常”,但如果有了像严老太那样较真市民的敲打,必将大大提高政府工作的质量。

严老太“被慰问”应该得到一个说法,名誉权诉讼虽然被法院驳回,但她不愿充当街道办虚假宣传道具的愿望应当保护。

让“孝”的力量传递得更远

席敏

重阳节前夕,山东省一家民营企业向6500名员工的父母发放了138万元“孝工资”。自2010年4月至今,这家企业每月向员工父母发放“孝工资”,累计已达4400余万元。企业参与敬老爱老助老,值得肯定。

“孝”是我国传统美德之一。在当代社会,传承和发扬“孝”文化,遇到了不少新挑战。我国是世界唯一60岁以上人口过亿的国家,又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高峰期,不少年轻人远离家乡创业,回家与父母团聚时间少。形成敬老爱老助老风气,需要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尤其需要相关用人单位支持。

企业向员工父母发放“孝工资”,是传承和发扬“孝”文化的有益尝试。据称,这份“孝工资”并不是从员工工资中扣除,而是由企业额外拿出资金通过邮局汇款或银行卡转账的方式直接发到员工父母手里,员工需要为“孝工资”缴纳个税,但其归属和使用均不受员工干涉。这样做不仅为企业文化注入新的活力,而且增进了员工与父母的情感。

企业向员工父母发放“孝工资”,能形成正能量的传递。当前,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异地求学就业,关爱老年人感情生活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民政部的数据显示,目前城乡空巢家庭超过50%,部分大中城市达到70%,老年人“亲情饥渴”现象十分突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当前社会需要让“孝”走出一家一户,有更多人关爱身边老人,让“孝”的力量传递得更远。

据新华社电

《一吐为快》

搞好心理教育何需“情报员”

丁烨

在每个班级安排两名小朋友专门搜集同学的各种“反常行为”,注意观察同学的情绪变化,类似早恋、精神恍惚甚至逃学、家庭不和睦等情况都是这两名小朋友关注的重点。这是深圳市南山区某小学最近在开展的一项心理互助活动。由同学来收集“基层情报”,以不具名的方式告知给心理老师,再由老师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不同形式的心理疏导。

(据南方新闻网)

这则小小“情报员”的新闻一出,舆论一片哗然,“特务教育”这个触目惊心的字眼再一次在网络上传流。昨天深圳市南山区前海小学负责人表示该新闻系媒体误读,学校并没有安排“小情报员”打小报告,且该活动内容是以“同学们之间互相倾诉的形式开展”。

然而,人们不难发现,无论“小情报员”是不是打了小报告,“小情报员”本身却是真实存在的。试想一下,10岁左右纯真无邪的孩子,每天除了学习和玩耍,还要眼神犀利,带着“任务”般地观察身边的同学,无论他们是否需要以“小报告”的方式向老师汇报情况,这都是一种十分可悲的教育。退一步说,即使“小情报员”发现了同学的异样,以这样的年龄与认知,他们是否能做到校方期许的“互相倾诉”,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笔者有两个疑问一直萦绕在心。其一,观察班级孩子的各种动态及心理异常,本是老师们应当承担的工作,如今却把这项艰巨的任务摊派了一部分给小学生,是什么初衷?其二,许多有心理问题的孩子最大的特点是封闭自己,不肯倾吐真相,老师也未必能做到的“倾诉”以



阎汝明 绘

缓解心理疙瘩,又如何能在尚未成年的孩子们之间轻易达到?

撇开深圳这所小学中的“小小情报员”,我们教育中的此类鼓励同学间互相揭发的事件屡见不鲜。早些年,老师鼓励班干部收集差生的劣迹做汇报,近年,又有媒体报道老师鼓励学生用小纸条的匿名方式揭发同学间的异常动态。此类鼓励“告密”的教育方式令人毛骨悚然,联想到中国历史上许多由此引发的悲剧,令人

不甚唏嘘。这是将人性中最“恶”的东西放大,并以“教育”这样崇高的形式来推行,它既不能达到主导者想要的效果,更极易在纯真的心灵上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关心自己的同学需要偷偷摸摸,因为这是见不得人的。很难想象,这种模式中培养出来的孩子能真正地爱自己的同胞,在他们的心中,正常的同胞之爱已异化成老师的指令。这种可怕的教育理念不仅需要坚决抵制,更需要教育部门用行政

手段予以剔除。

当跳楼、自杀等行为不断成为校园新闻的头条,心理问题已然成为许多学校关注的重点,这本是一件好事。不过,心理教育的本质是完善学生健全的人格与思考力,能够独立地面对人生中的各种挫折,而它的大原则正是“尊重”。尊重学生的人格与隐私,尊重学生的心声与选择,加上爱心与耐心,不需要“情报员”,也能将工作做好。

提拔官员怎能仅靠“以德服人”?

丁元元

又到重阳节,在孔子家乡山东曲阜,孝道如今成了对全体官员的硬性要求。市委书记在打造“彬彬有礼道德城市”动员大会上说:不孝者不得提拔重用!

(据新华网)

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孝顺,怎能成为一个好官?按照传统观念,道理完全说得通,而且也能为所有人接受。但是,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一个德行高尚的官员,如果能力平庸,不仅未必能在任上“行善举”,往往还会“好心办坏事”。

因而从制度的角度来说,与其抱着“人性本善”的善意,选拔、提拔“有德行”的官员,反倒不如推定“人性本恶”,考察干部只注重能力,而用严格的监管来限制能吏们做出任何“恶行”。

当然,考察官员的标准有很多,德行只是其中之一。笔者并非认为,在任用官员中,对于品格——比如是否遵从孝道的考察,不应列入评定范围,但其中的核心问题在于,每一条标注如何量化,如何科学地进行认定。比如,曲阜市打造“彬彬

有礼道德城市”,要求官员们“每周帮父母做一次家务;每月带父母理一次发,给父母洗一次脚;每年给父母的生活费用不少于月平均工资或收入……”

这些标准是否有切实的参考价值,有没有好的办法监督、评定官员们的落实情况?如果可以,那么我们为这个有益的探索喝彩,否则,残酷的真相却可能是——想要官员“德才兼备”,最后却也可能因为操作层面的问题,选出“德薄才疏”。

所以,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当曲

阜市建一个“彬彬有礼城市”,所能想到的仍然是和孔子时代无异的各种文明礼仪的教育。然而,仅仅靠“学习”,力量太有限了——那些锒铛入狱的贪官污吏总是说:“这些年来放松了学习。”但这究竟是真心话,还是一句搪塞的借口?

时至今日,在选拔、提拔干部时,仍不得不大谈注重孝道等,似乎在提示着我们某种焦虑,因为缺失了一种制度性的有力的监管机制,选拔任用官员仍然只能依靠“泛道德化”的标准——这着实有些苍白无力。